

# 青年成长与大众创新创业

## 北京社科院举行第32期公共政策学术沙龙

■ 陆小成 北京社科院

近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第32期公共政策学术沙龙在本院六层会议室举行。本次沙龙的主题是:青年成长与大众创新创业。本次沙龙主要是结合五四青年节活动契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提出的要“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五点要求和树立“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的四点青年价值观的基本精神,由北京社科院青年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共同举办,北京市市情中心副主任陆小成博士主持;来自北京市社科院市情中心、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社会学所等单位研究人员参加了本次活动;北京市社科院院机关党委委员、社会学所副所长江树华受邀参加了此次学术交流。北京市市情中心主任、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唐鑫作为学术顾问对本次沙龙进行点评和指导。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江树华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战略举措。在创新创业发展的过程中,经济转型和市场化发展对于创业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中国人力资本不断提升,创业体系不断趋于完善,创业环境逐步优化,成为推动创业发展的有利条件。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相关政策,增强政策扶持和激励作用,针对大学生创业、女性创业、海归创业等不同社会群体创业的特点,加强分类指导,完善创业就业服务,解决制约创业发展的障碍,着力构建和完善创新创业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中心博士后何仁伟副教授认为,需要深入研究创业群体的个体化差异,将创业与就业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创业的各种影视因素。由于学历不能代表人力资本,学历不高,但有某些技能特别是祖传的技能,创业的可能性比较大,成功率也比较高。因此,创业与周围市场环境有关,

也与个体的自身实力有关。此外,现在的创新创业呈现出集群化特征,如中关村不仅是高科技企业集聚地,也是高科技创业集群地,创新创业氛围相对其他地区要强很多。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中心李茂博士认为,创新创业成功容易引起人们关注,但创新失败更值得研究,对于一般人而言更有启发性。研究创业失败的原因,为后来创新创业者提供前车之鉴,这种经验更为宝贵,创新创业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要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氛围和创新精神。

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研究人员阮强认为,当前,创新创业主要表现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要抓住时代的脉搏,如小米手机是从洗车软件做起的,后来根据时代发展需要,注重降低手机价格,进行了手机创新,获得小米的成功。二是要有吸引人的特质,如现在比较时尚的是要好玩,有好的idea。三是要有一定的积累,如知识、技术、人脉、资源等多种因素的集成才能实现创新创业。也就是说有好的想法,与时代很好地结合,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实现创意、创新、创业的成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中心田蕾博士认为,在当前的互联网经济背景下,从大学生到创业成功,离得非常近,许多充满创意的软件很流行,一旦有好的想法就要抓住机遇进行实践。特别是要抓住互联网的要领,要了解90后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创新创业。不过,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是有名校的效应作支撑,名校意味着有强大的人脉圈,风投首先也会考虑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大学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中心贾澎博士认为,要研究创新创业的内生机制问题。国家提出鼓励青年人创新创业,有利于推进社会进步,社会进步又将进一步促进创新和创业。但创新创业更重要的是需要自我意识提升,特别是解决物质层面的匮乏问题。一般而言,越贫穷,越无力。没有足够的钱,物质上的贫乏可能导致更厉害的是精神上的贫乏,对自己的失去信心和信念。民间流传着缺钱会带来穷人思维,越穷越不敢放弃面包,去选择更好



的东西。青年人应该提倡思想上的解放、精神上的自由。习近平总书记希望青年人要有信念,要有高尚的品格,要能艰苦奋斗的精神。从实践的角度看,青年人要勇于创新,锻炼过硬本领。创新来源于本事,不是瞎折腾,要更加促进本来能力的提升。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中心陆小成博士认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必然产物。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要改变传统模式,需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同时区别于实验室、注重科研人员创新的传统模式,创新2.0时代更加强走出实验室的多主体、全覆盖、大众化的创新创业模式。因此,创新创业既是当前经济低迷或者速度降低下的必然应对,也是在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知识化、大众化背景下的时代潮流。从宽泛意义上看,创新创业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包括技术、制度、管理、文化、运营模式等的改革与变化都可以理解为创新,创新模式的不断复制和成型、创新收益的不断累积和乘数放大就能实现创业。任何的改变、革新带来个体或者社会收益的改进都是创新,这应该是每个人、组织乃至整个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很多的高校、企业、社会组织都吸引许多有创意的人经常性的在一起讨论、争论、碰撞,形成某些创意和创新,进而通过创业实践获得成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情中心主任、北京世界城市研究基地秘书长唐鑫点评时指出,当前,有的地方已经由暂时的贫困发展到隔代的贫困,收入差距变成了财产差距,穷人的孩子已经难以“早当家”,这会形成社会问题和不稳定的风险,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再次提出弘扬创业精神并与创新联系在一起,具有重要意义。现在人们常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主要是指受教育的机会要平等,只有教育搞好了才能夯实教育创新的基础。应该让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永远成为过去。创业创新需要良好的氛围,至少大学要培养学生这方面的意识。瑞典是个福利国家,我访问过该国的哥德堡大学,发现那里的创新创业氛围很浓厚,学生们抓紧点滴时间学习并参加社会实践,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为将来的就业做准备。由于是福利国家,那里的就业压力不大,但是学生们的创业意识很强,这与大学的相关教育有关。培养学生的创业创新能力应该成为大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另外,国家应建立健全相关的体制机制,激励青年创新创业。我们今天举办这个沙龙,就是响应中央的号召,引起大家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视,增强自己的创业创新意识,同时关注如何提高全社会的创业创新水平,并为此做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 中国存款保险能避免道德风险吗?

■ 钟正生 牛播坤 中国华创证券研究所

5月10日,中国央行宣布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和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同时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3倍调整为1.5倍。作为中国央行“寓改革于调控中”的政策组合拳的一个组成部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扩大并不令人奇怪。资本市场甚至普遍预期,存款利率管制的最完全放开,即利率市场化进程程序上的完结,似乎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中国央行之所以敢于如此快速地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显然与呱呱坠地的存款保险制度已为金融体系构筑了一层安全网密不可分。中国央行有关负责人在降息后的答记者问中指出的,“存款保险制度的顺利推出,以及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加快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无疑道出了个中真意。

随着5月1日存款保险制度的正式实施,一直以来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隐形担保逐步走向显性,这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民营银行准入创造了条件。然而,如何使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以及长期以来坚信国家会无条件兜底的存款人相应调整其行为,国家担保制度的显性化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地位的银行体系,以及长期以来坚信国家会无条件兜底的存款人相应调整其行为,国家担保制度的显性化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纵观全球各国的存款保险制度,我们看不到清晰和齐整的效果评估。存款保险究竟是降低还是提高了系统性风险,答案莫衷一是;道德风险与稳定效应的平衡,抉择孰非易事。就此而言,相信“存”解千愁的人,未免过于轻信和乐观。

### 不一样的存款保险

截至2014年10月,全球共有11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各国存款保险制度在组织类型、责任模式、投保形式、费率制度和解决框架等核心问题方面却不尽相同,可用“三、二、三”这几个数字来做下分类。

**三种责任模式:付款箱、损失最小和风险自担。**付款箱模式,存款保险机构主要负责对受保存款进行赔付,以俄罗斯、中国香港、澳大利亚等为代表。损失最小模式,在银行出现问题后,存款保险机构积极参与处置,以处置成本最小化为目标,以加拿大、法国、日本等

为代表。风险最小模式,存款保险机构除拥有广泛的风险控制和处置职能外,还拥有补充监管的权力,通过采取早期纠正等措施,积极防范和化解风险,以美国、德国、中国台湾为代表。

**两种投保形式:强制和非强制。**强制类型以加拿大和中国香港为代表。非强制类型以德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美国则采取强制与非强制相结合的形式。联邦储备体系成员银行必需参加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存款保险计划,非联邦储备体系的州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可自愿加入存款保险计划。

**两种费率制度:浮动费率和风险差别费率。**浮动费率指所有机构按统一费率征收并随时调整。风险差别费率指不同的风险投保机构按风险大小征收不同费率。前者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代表,后者以德国和中国香港为代表。

**三种问题银行处理方案:法律、特别处理机构或者两者的结合。**法律方案以中国台湾为代表。特别处理机构以韩国和美国为代表。两者结合以德国和中国香港为代表。

(下转 03 版)

## “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城市

■ 赵磊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上接 01 版)

### 内蒙古乌海:从“煤炭的颜色”到“墨汁的颜色”

2011年11月,我受邀为内蒙古乌海市的领导干部作《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辅导报告。我当时十分好奇,为什么西北那么偏远的城市如此重视文化建设。当时,我最难忘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城市要由原来的“挖煤”升级为“挖文化”。

乌海市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新兴工业城市,人口50万,因煤而生所以叫“乌海”。乌海煤炭保有探明储量24.4亿吨,多为优质焦煤,占内蒙古自治区已探明焦煤储量的60%,是国家的重点焦煤基地。今天,乌海市已经举办了六届“黄河明珠·中国乌海书法艺术节”,三届国际书法产业博览会。

2008年乌海市被中国书协正式命名为“中国书法城”,乌海这座年轻的城市,正在以书法带动城市旅游与文化发展。原来,煤炭是这座城市的品牌,今天“翰墨飘香”为乌海打造了一张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市名片。

2012年8月,由中国书协、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内蒙古乌海市联合举办

的首届国际书法产业博览会暨第四届黄河明珠·中国乌海书法艺术节在乌海市隆重举行。来自日本、韩国、法国、匈牙利等16个国家的大使、参赞、著名艺术家、学者和国内40多个城市的著名书法家 and 各界人士参会。这次国际书法产业博览会面向全球征集书法作品300余幅,组委会从中选出200余幅,连同邀请的名家作品共计600幅,在国际书法艺术大展上进行了展览和拍卖,展拍的直接销售额近2000万元人民币。

书法这一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能在乌海这样一个建市仅30多年、5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得到广泛普及和快速提高,决非偶然。乌海市曾经因煤而兴,但也因煤而困。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矿工,矿工升井之后,由于要释放压力,往往选择打牌、赌博、酗酒,整个城市乌烟瘴气、酒气熏天,很多人饮酒还远离这个“文化沙漠”。为此,1994年市政府做出了《关于创建书法城的决定》,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让大家习练书法是“形式主义、走马观花”,但这个“走马观花”一走就是二十年,已经发生了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乌海书法从最早的矿工书法陶冶,到工会、企业、民间书法组织的诞生,到乌海书法家协会的成立,到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乌海分校的建立;从书法爱好者自己组建书法文化沙龙,到成立乌

海书画院,到获得国家级书法城的美誉。以文化带动经济发展,成为这个黄河之滨资源型城市调整经济结构的一大亮点。

目前,全市共有中国书协会员21人,自治区书协会员121人,市级书协会员1500人,全市成人常年习书者5000多人,大、中、小学生习书者近80000人;书法作品在全国参展、获奖的数量占到内蒙古自治区参展、获奖总数的四分之一强。该城市未来的方向是,以国际书法产业博览会为契机,努力打造乌海市全国书法书画培训与教育、奇石观赏品鉴平台的建设。

今天,一些乌海书画名家的作品由几年前的百元升值到现在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出现了经营书画艺术的中介机构,全市画廊、字画店、装裱店已发展到近百家;“家中无字画,不是乌海人”已成为乌海的一种社会风气。乌海市将书法城建设与发展旅游业结合起来,正在建造以书法文化特色为主体的书法名山——中华书法山公园,甚至街路两旁的路灯都被设计成了毛笔形状。

总之,丝路城市的成功与否不单纯看经济增长指数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看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含金量,经济与文化的联姻,是全球化时代的突出特征,也是“一带一路”丝路城市魅力的应有之义。

对此,中国丝路城市要做精致资源,要打造有品质、有品牌的旅游与文化产品,去展现中国城市的美好态度。2014年底我去英国访问,从机场往爱丁堡走的时候,一位英国朋友指着面前的一片城市建筑说,“这是我们的新城,是18世纪的。”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追问道:“新城是18世纪的,老城是什么时候的?”对方淡淡且自豪地回答:“老城是14世纪的。”这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时间就是金钱,即要做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伟大事业。

还有一次我去意大利访问,在罗马市中心广场有一个建筑,从外表看它显得破旧、杂乱,但听了介绍之后,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这个古老的建筑由三部分拼凑而成,下面的地基部分是2000年前古罗马的建筑,上面的主体部分是1000年前中世纪罗马的建筑,旁边的附属部分是500年前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建筑。可见,一个建筑将2000年、1000年、500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正展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历史与文化负责任的态度,这样的城市是永恒之城,每一块砖石都会呼吸,会有持久的吸引力。“一带一路”对中国而言,不仅是经济崛起的良好契机,更是中华民族文明性崛起的自我要求,其目的是要将国际社会对中国城市的好奇上升到由内而外的欣赏与认同。(完)

## “一带一路”:为什么是中国

■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上接 01 版)

高储蓄支持中国高投资能力。中国资本形成规模2010年第一次超过美国,2011年约是美国1.37倍。因而中国有能力在保持国内投资需求较快增长同时,帮助沿线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建设。

作为比较,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大都面临国民储蓄率趋势下降问题。2013年美国和日本储蓄率都已降到约18%。依据对美国与日本资本产出比、资本存量、资本折旧等宏观经济指标的估测,两国即便把所有储蓄都变成国内投资,也难以实现净投资及投资存量较快增长。储蓄率偏低与固定投资不足,是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目前比较普遍面临的宏观经济约束,这一情形下自然没有很多余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投资发展。

目前中国拥有全球单个国家最大规模外汇储备,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至少有两方面支持作用。一是在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竞争先恐后地实施超级宽松货币政策积累风险环境下,大规模储备有助于应对外部金融形势可能动荡带来的冲击,保证“一带一路”实施进程具有最大稳定性。二是在区域内货币尚未普遍国际使用前提下,美元仍承担国际结算和支付手段。在有关工程项目需要到区域外国家配套采购场合,美元的国际支付流动性更是不可缺少。

不过外汇储备作用或许没有一般想象得那么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对“一带一路”投资项目所需资本品与其他设备材料具有比较系统的配套供应能力,因而对储备资产产终极需求可能比较有限。随着区域内经济发展及其对区域外中高端资本品及其他特殊配套产品进出口替代能力提升,随着区域内国家货币的国际使用程度提升,上述辅助功能的重要性将呈下降趋势。一国外汇储备是国民储蓄的转化形式,就对本文讨论问题重要性而言,中国拥有充裕国民储蓄应是第一位的。

21世纪初中国经济快速追赶,然而受制于汇率改革滞后与高储蓄率背后结构性因素,积累了过量外汇储备。增持外汇储备意味着中国不断把国民储蓄借给供应储备资产的债务国,伴随中国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过量债权积累。这个运行模式对危机前中国及全球经济增长发挥了一定支持作用,然而后危机时代越发展显示其不可持续性。共建“一带一路”意味着中国富余储蓄今后将更多转化为在沿线国家生产性投资及相应债权,标志中国利用国民储蓄方式将逐步发生转折性变化,并有望对全球范围储蓄跨国配置方式产生显著影响。

### 合作共赢的经济逻辑

共建“一带一路”愿景与规划,其具体战略设计与实施方案必然包含复杂内容与细节。然而至繁之事必有至简之理。以“为什么是中国”为题,从各国发展诉求与中国独特禀赋条件对接关系分析,“一带一路”自有其简明清晰的经济逻辑。什么是发展?如何谋发展?开放环境对发展有何影响?“一带一路”实践对理解发展经济学上述重大问题有启示作用。

后进国家经济通常有类似结构特点:如基础设施条件差,资源开发能力弱,体制政策效率低,缺乏熟练工人和各类人才等等。一国经济进入快速成长轨道,根本动力当然要靠自身努力和内因作用,发展意愿与体制政策选择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符合规律与切实有效的外部合作,也能对突破贫困陷阱与进入起飞状态发挥重要助推作用。中国凭借新兴大国经济的组合优势特点,有可能通过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提供全新的合作发展契机。

凭借制造与建造方面的出色能力,中国能为经济后进国家提供性价比最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方案;借助阶段性充裕的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资源,中国能有效帮助沿线国家超越储蓄与贸易“双缺口”对起飞发展的制约;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或产品区段,随着国内要素价格上升会在市场机制和比较优势规律作用下逐步向国外转移,为沿线承接转移国家创造非农就业、提升人力资本、发挥比较优势提供现实机遇;中国与有关国家共享改革发展经验,有望为沿线国家体制与政策诱致性改革变迁提供善意有效的推动力。

当然,“一带一路”并非仅限于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而是亚欧大陆之间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的合作行动。不过中国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已经并将继续在这个进程中发挥特殊作用。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将有机会向世界展示自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最好合作发展伙伴,中国和平发展伟业也有望从中获得广泛助益。